

珠三角粵語三字格詞語中變調特點及其趨勢

——以廣州、香港、澳門、佛山為例

李子珊* · 羅言發**

目 录

1. 前言
2. 廣州話三字格變調的類型
 - 1) 連讀變調
 - 2) 語義變調
3. 粵語三字格變調的歷時情況
 - 1) 年齡化趨勢
4. 粵語三字格變調的共時情況
 - 1) 選地問題
 - 2) 城市分級體系
5. 廣州話三字格變調的原因
 - 1) 區分語義
 - 2) 浮游聲調
6. 總結

中文摘要

本文以廣州話三字格詞匯為研究對象，變調以高平55、高升35為主，亦出現變入35。再細分為連讀變調、語義變調。筆者結合歷時（年齡化趨勢）與共時（城市分級體系）角度，對廣府片三地（香港、澳門、佛山）作整體對比，得出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變調速度是一致。筆者再參考詞匯學和音系學的觀點，認為廣州話三字格變調詞中後兩字是

* 澳門大學中文系碩士生在讀(第一作者)

** 澳門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通訊作者)

黏著關係，因此變調以後字居多。結合兩者推測廣州話變調的成因：區別語義、浮游聲調，前者屬語義變調，後者為連讀變調。現時廣州話變調的文獻大部分集中說明單字和雙字情況，本文針對廣州話三字格變調情況填滿空白位置。

关键词：三字格；广州话变调；变入；年齡化趨勢；城市分級體系

1、前言

三字格，顧名思義，是指一個詞由三個音節組成，是漢語詞彙系統中極具特色的組成部分。其不僅在結構上呈現出簡潔規整的特點，在語音表達上也有著獨特的規律，聲調組合始終遵循自然語感的原則，極力避免聲調之間產生衝突，變調現象十分普遍，這一特性在漢語各方言中均有體現，作為粵語代表的廣州話也不例外。

廣州話三字格變調詞最顯著的語音特徵是音節之間緊密結合，不存在明顯的語音間隔。為了增強口語表達中的重複性，讓核心資訊更加突出，其常常運用多種語音手法，除了常見的聲調搭配、疊音變調、諧音雙關之外，還會通過聲調的強弱對比、音節時長的細微調整等方式，讓表達更具感染力和表現力，使其在日常交流中能夠更高效地傳遞資訊，貼合口語化的溝通需求。

1) 單字變調研究

粵語單字變調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859年，John. C在其著作《英粵字典》中首次對廣東話的變調情況進行了記錄。作者描述廣東話的聲調共有9個，而當時所發現的變調類型相對較少，僅包括高平55和高升35兩種，為後續粵語變調研究奠定了基礎。

到了1941年，黃錫凌所著的《粵音韻彙》對粵語單字變調進行了進一步的

細化研究，將變調明確分為超平（即高平55）和變上（即高升35）兩類。更為重要的是，該書首次清晰地提及了入聲變調，並將其稱為“介入”。具體來說，原本中陰入、低陰入的調值會發生變化，轉變為35調，這兩種入聲變調的區別主要在於韻尾，分別帶有較短促的-p、-t、-k韻尾，豐富了對粵語單字變調的認知。

2) 雙字變調研究

20世紀70年代，粵語雙字變調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1970年，張洪年在《香港粵語語法研究》中首次系統地描述了雙字組的連讀變調現象，尤其對重疊詞和複合詞中的變調規律進行了深入探討，為雙字變調研究構建了基本框架。

1972年，Yue從音系學角度對粵語雙字變調展開分析。2000年，Chen也進行了相關研究，兩人均發現粵語雙字變調存在右向變調的特點，即變調主要發生在雙字組的後一個字上，這一發現為後續從音系理論層面深入解讀粵語變調機制提供了重要依據。

3) 三字格變調研究

相較於單字變調和雙字變調，粵語三字格變調的相關研究文獻相對匱乏，研究成果較為零散。而本次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一方面致力於探尋城市分級體系與粵語三字格變調之間的內在關聯，另一方面也能夠填補粵語三字格變調研究領域的文獻空白，為後續相關研究提供堅實的基礎和有益的參考。

(1) 研究思路

變調指的是同一字詞在字型、意義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出現不同聲調的現象。其產生並無固定的規律性，不受詞性、方向、類型等因素的局限，難以通過語言環境直接探究其規律，因此只能借助以往的書籍文獻記載，結合多維度的對比分析來開展研究。

粵語變調作為粵方言地區獨特的文化符號，承載著地域文化的基因。同一語言體系內的不同地區，其語言文化具有互通性，變調情況也存在一定的關聯性，而這種關聯的深淺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出地區之間的文化融合度以及發展潛力。

(2)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參考的所有材料均對每個字的音標和聲調進行了明確標記，涵蓋粵語音標和國際音標。筆者運用歸納法，對文獻資料中出現的三字格變調詞進行全面、系統的整理，逐一核對每個詞彙的聲韻調，最終形成廣州、香港、澳門、佛山四地的粵語變調詞表格。通過方言對比的方式，對四地的變調詞表格進行整合，梳理出粵語三字格變調的類型、模式等核心特徵，從而全面瞭解粵語三字格變調的歷史與現狀，為推測其變調方向的成因提供依據。

同時借助文獻對比，清晰呈現粵語三字格變調的演變過程及變化速度。在明確變化速度的基礎上，深入分析城市經濟發展水準與變調演變速度之間是否存在相關性，探究經濟因素對語言演變的潛在影響。選取四地共有的變調詞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其變調方向是否出現同化現象，結合當前的演變規律和影響因素，對粵語三字格變調的未來發展趨勢進行合理預測，最終得出研究結論。

2、廣州話三字格變調的類型

廣州話變調可分為連讀變調和語義變調兩種。連讀變調，是指單純語音變

調，與本調意思相同，沒有出現更多語義。語義變調指與詞匯、語法意義及說話者的感情色彩有密切關係，表示具體、常見的，本調則表示抽象、罕見的。有學者提出變調是指連讀變調，而變音是指語義變調，聲調受聲、韻母改變。因此，本文只探討有調值變化的三字格詞組，不考慮其聲韻母之間變化。

1) 連讀變調

當兩個或兩個以上音節連在一起時，音節的高低升降往往發生變化，這種現象稱為“連讀變調”(李小凡 2004)。粵語連讀變調分為高平55及高升35，由於現時大部分廣州人已經把53合併為55，本文提及的高平變調均為55。高升35根據詞語中子、仔字尾脫落形成，本文第五章詳細提及。

2) 語義變調

語義變調作為特定語義的標誌，是以詞為單位。在雙或多音節詞中，變調一般出現在後一音節，也是分為高平55或高升35。從語義角度，將廣州話語義變調分出四種變調類型：

(1) 名詞

高平變調中絕大部分是名詞，而且約有一半是物件名，四分之一和人有關。高升變調則以名詞居多，占六成。(張洪年 2000)

名詞性變調 (廣州話)	意思：
拗胡婆 [au ⁵⁵ wu ²¹⁻⁵⁵ p ^h o ²¹⁻³⁵]	傳說中的一種怪物，大人常用來嚇唬小孩
荷蘭薯 [hɔ ²¹ lan ²¹⁻⁵⁵ j̃y ²¹⁻³⁵]	馬鈴薯
角落頭 [kɔk ³³ lɔk ²²⁻⁵⁵ t ^h eu ²¹⁻³⁵]	角落。屋角

從上述例子看，名詞變調前後的核心語義並未發生改變。儘管名詞變調未帶來語義變化，但筆者認為仍應歸為語義變調，因為這類變調主要集中於名詞，有鮮明語義指向性，可作為識別名詞語義類別的輔助語音標誌。而且具有強化名詞指稱功能、區分於其他詞類，助力語義清晰表達與順暢交際。

(2) 親屬詞

趙元任（1947）提到變調是表示熟悉事物的意義。粵語變調指人的詞以親屬詞占多數，其特點是表達親密的情感態度。

名詞性變調（廣州話）	意思：
姑奶奶 [ku ⁵⁵ nai ¹³ nai ¹³⁻³⁵]	即姑祖母，指父親的姑母，爺爺的姐妹
姐姐仔 [tʃɛ ³⁵⁻²¹ tʃɛ ³⁵⁻⁵⁵ tʃɛi ³⁵]	小姑娘
伯爺婆 [pak ³³ jɛ ²¹⁻⁵⁵ p ^{hɔ} 21-35]	老太婆

(3) 小稱

粵語小稱變調是一種語用手段，表熟悉、親切、小稱，甚至表輕蔑，其語義功能主要是指某種具體事物，多發生於口語常用名詞，表小功能不明顯。如：陳姓，本音讀[tʃɛn21]，用於泛指陳姓人士或不熟悉的陳姓者，而小稱變調後讀[tʃɛn13]，特指雙方交談中都熟悉的那位陳姓人士，而非任意一位陳姓者，清晰體現了小稱變調表特指、區分不同事物的核心功能。

表1：粵語地區變調的功能不同

粵語地區	主要功能	次要功能
粵西/廣西 粵語	表小（區分同一事物大小，可類推）	表特指（區分不同事物，不可類推）
廣府粵語	表特指（區分不同事物，不可類推）	表小（區分同一事物大小，不可類推）

粵語小稱變調的表小功能已經退化，表特指以區分不同事物上升為主要功能。小稱變調主要發生在常用名詞中，讀音基本已經固定，無規律可循。

(4) 形容詞

粵語的疊音形容詞可分為前字變調及後字變調。前字變調表程度加深，如：長長、大大、紅紅，前字都讀高升35，後字為原調。疊音詞變調的意義基本上是沒有變化，只是程度的不同，相當於英語形容詞的比較級。在粵語三字格詞語較少出現前字變調，所以作簡單論述。

而後字變調可分為ABB和AAB兩類，如下表：

表2：粵語疊音形容詞的變調類型

變調調值	ABB	AAB
-55	薄切切、光脫脫、短切切、白雪雪、眼矇矇、瘦孳孳、黑麻麻	/
-35	嘴歛歛	咕咕聲、立立亂、擒擒青、 <u>丞丞轉</u>

AB是有關聯的兩個語素，形容事物的狀態或動作，B起著強調的作用。

粵語還可以用固定形式“AA咗”表示量少，當中A為形容詞。重疊後，第二個A念高升35。但如果A是陰平或上陰入，重疊後則不會出現變調，因陰平和上陰入同為55調(高調)，而粵語變調一般是低調轉高調。

表3：粵語疊音形容詞變調的程度比較

程度輕	原調	程度較重
肥肥咗 [fei ²¹ fei ²¹⁻³⁵ tei ²²⁻³⁵]	肥 [fei ²¹]	肥肥 [fei ²¹⁻³⁵ fei ²¹]
閑閑咗 [han ²¹ han ²¹⁻³⁵ tei ²²⁻³⁵]	閑 [han ²¹]	閑閑 [han ²¹⁻³⁵ han ²¹]
麻麻咗 [ma ²¹ ma ²¹⁻³⁵ tei ²²⁻³⁵]	麻 [ma ²¹]	麻麻 [ma ²¹⁻³⁵ ma ²¹]
靜靜咗 [tʃɿŋ ²² tʃɿŋ ²²⁻³⁵ tei ²²⁻³⁵]	靜 [tʃɿŋ ²²]	靜靜 [tʃɿŋ ²²⁻³⁵ tʃɿŋ ²²]
怯怯咗 [hip ³³ hip ³³⁻³⁵ tei ²²⁻³⁵]	怯 [hip ³³]	怯怯 [hip ³³⁻³⁵ hip ³³]

值得一提，廣州話三字格變調必須遵循二字格變調規則。Matthews & Yip (1994) 強調音步拆分，即三字格分解為子結構 (2+1 或 1+2)，前字變調由 2 作主導。如果前兩字已是固定變調詞組，如二字格：黃沙（廣州地名）、縣城、相機、隊員等，那麼三字格也會出現前字變調，如：黃沙地、影相機等。因此，得出廣州話三字格前字變調只限於二字是固定變調詞組，目前仍然以後字變調居多。

3) 變入

變入,是指入聲字出現變調的情況。而廣州話入聲字會出現55、35變調，稱“變入”，亦有學者稱“介入”¹⁾，而入聲也按照低調變調原則，只有下陰入、陽入變，上陰入不變。而變入在上述兩種變調類型(連讀、語義)均會出現，可見此現象在珠三角地區的影響是顯著。如果廣州話聲調加入“變入”，則生成十聲六調，得出較完整的聲調現象。

表4：《廣州方言詞典》中入聲變調的分類

入聲變調	轉變調值	例子	國際音標
下陰入	33-55	光脫脫	[kuoŋ ⁵⁵ t ^h yt ³³⁻⁵⁵ t ^h yt ³³⁻⁵⁵]
		短切切	[tyn ³⁵ t ^h it ³³⁻⁵⁵ t ^h it ³³⁻⁵⁵]
		白雪雪	[pak ²² .fyt ³³⁻⁵⁵ .fyt ³³⁻⁵⁵]
		瘦孳孳	[fəu ³³ mak ³³⁻⁵⁵ mak ³³⁻⁵⁵]
	33-35	胭脂腳	[jin ⁵⁵ tʃi ⁵⁵ kœk ³³⁻³⁵]
		掛臘鴨	[k ^h wa ³³ lap ²² ap ³³⁻³⁵]
陽入	22-55	角落頭	[kək ³³ lək ²²⁻⁵⁵ t ^h eu ³⁵]
		黑墨墨	[hek ⁵⁵ mək ²²⁻⁵⁵ mək ²²⁻⁵⁵]
	22-35	二打六	[ji ²² ta ³⁵ lok ²²⁻³⁵]
		夜遊鶴	[je ²² jəu ²¹ hək ²²⁻³⁵]
		唔聽笛	[m ²¹ t ^h ɛŋ ⁵⁵ tek ²²⁻³⁵]
		立立亂	[ləp ²² ləp ²²⁻³⁵ lyn ²²]

1) 黃錫凌. 1941 《粵音韻彙》記載入聲變調為“介入”。

3、粵語三字格變調的歷時情況

從社會語言學角度，模仿讀書人或者知識份子可以說是語音改變的社會動機。讀書人一般文化水準高，是大家模仿的對象，久而久之，把讀書音和口音分開。麥耘（1990）也有提到特殊35調字向書面語滲透，如：江山如畫、指鹿為馬，讀書的時候多用本調，談話多用變調。

年齡會顯著影響粵語三字格變調，老年發音人受書面語、讀書音影響更深，青年更趨口語化、變調使用可能更高。為探究此影響，筆者選取廣州、香港、澳門、佛山四地，各邀老、青發音人各一位，對三字格變調詞進行筆錄，如下表：

表5：廣州話老、青發音人的變調區別

粵語三字格變調詞	老發音人 ²⁾	年輕發音人 ³⁾
來路貨	loi ²¹ lou ²²⁻³⁵ fo ³³	loi ²¹ lou ²²⁻³⁵ fo ³³
暖水壺	nyn ¹³ foj ³⁵ wu ²¹	nyn ¹³ foj ³⁵ wu ²¹⁻³⁵
二打六	ji ²² ta ³⁵ lok ²²	ji ²² ta ³⁵ lok ²²⁻³⁵
晒熱頭	ʃai ³³ jit ²² tʰeu ²¹	ʃai ³³ jit ²² tʰeu ²¹⁻³⁵
草花頭	tʰou ³⁵ fa ⁵⁵ tʰeu ²¹	tʰou ³⁵ fa ⁵⁵ tʰeu ²¹⁻³⁵

表6：香港粵語的老、青發音人的變調區別

粵語三字格變調詞	老發音人 ⁴⁾	年輕發音人 ⁵⁾
來路貨	loi ²¹ lou ²²⁻³⁵ fo ³³	loi ²¹ lou ²²⁻³⁵ fo ³³
暖水壺	nyn ¹³ foj ³⁵ wu ²¹	nyn ¹³ foj ³⁵ wu ²¹⁻³⁵
二打六	ji ²² ta ³⁵ lok ²²	ji ²² ta ³⁵ lok ²²⁻³⁵
晒熱頭	ʃai ³³ jit ²² tʰeu ²¹⁻³⁵	ʃai ³³ jit ²² tʰeu ²¹⁻³⁵
草花頭	tʰou ³⁵ fa ⁵⁵ tʰeu ²¹⁻³⁵	tʰou ³⁵ fa ⁵⁵ tʰeu ²¹⁻³⁵

- 2) 發音人1：俞嘉，62歲，廣東廣州人。
 3) 發音人2：陳家琪，26歲，廣東廣州人。
 4) 發音人3：黃麗嫻，76歲，香港人。
 5) 發音人4：李嘉樂，22歲，香港人。

表7：澳門粵語的老、青發音人的變調區別

粵語三字格變調詞	老發音人6)	年輕發音人7)
來路貨	loi ²¹ lou ²²⁻³⁵ fo ³³	loi ²¹ lou ²²⁻³⁵ fo ³³
暖水壺	nyn ¹³ foj ³⁵ wu ²¹	nyn ¹³ foj ³⁵ wu ²¹⁻³⁵
二打六	ji ²² ta ³⁵ lok ²²	ji ²² ta ³⁵ lok ²²⁻³⁵
晒熱頭	fai ³³ jit ²² t ^h eu ²¹⁻³⁵	fai ³³ jit ²² t ^h eu ²¹⁻³⁵
草花頭	t ^h ou ³⁵ fa ⁵⁵ t ^h eu ²¹⁻³⁵	t ^h ou ³⁵ fa ⁵⁵ t ^h eu ²¹⁻³⁵

表8：佛山話的老、青發音人的變調區別

粵語三字格變調詞	老發音人8)	年輕發音人9)
來路貨	loi ⁴² lou ²²⁻³⁵ fo ³³	loi ⁴² lou ²²⁻³⁵ fo ³³
暖水壺	nyn ¹³ foj ³⁵ wu ⁴²⁻³⁵	nyn ¹³ foj ³⁵ wu ⁴²⁻³⁵
二打六	ji ²² ta ³⁵ lok ²²⁻³⁵	ji ²² ta ³⁵ lok ²²
晒熱頭	fai ³³ jit ²² teu ⁴²⁻³⁵	fai ³³ jit ²² t ^h eu ⁴²⁻³⁵
草花頭	t ^h ou ³⁵ a ⁵⁵ teu ⁴²⁻³⁵	t ^h ou ³⁵ fa ⁵⁵ t ^h eu ⁴²⁻³⁵

綜合四地老、青發音人變調筆錄，兩者變調整體一致但差異明顯，老年發音人變調頻率低、多本調，青年變調頻率高，證實粵語三字格變調頻率隨年齡增長而下降，此現象與麥耘（1990）理論相印證。

4、粵語三字格變調的共時情況

1) 選地問題

為深入探究粵語三字格變調的共時特徵及影響因素，本文選取廣府片的香港、澳門、佛山與廣州四座城市展開對比研究。四座城市均隸屬大灣區，地緣

6) 發音人5：馮帶喜，81歲，澳門人。

7) 發音人6：黃韻詩，26歲，澳門人。

8) 發音人7：唐銘波，61歲，佛山桂城人。

9) 發音人8：何偉標，34歲，佛山桂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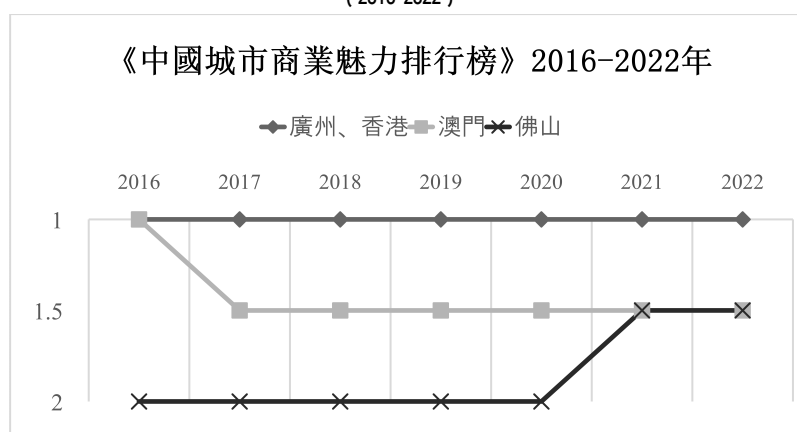
相近、人文相通，具備強烈的可比性。廣州與佛山地域相連，歷史上同屬粵語核心文化圈。香港與澳門均以粵語為第一語言的特別行政區，不僅在語言使用上保持了粵語的核心地位，且經濟高度發達，在大灣區語言文化互動中佔有重要地位。基於此，筆者聚焦廣州及其相鄰或區域內緊密關聯的地區，旨在考究其粵語變調的演變規律是否與城市發展速度呈現對應關係，為粵語語音演變研究提供來自大灣區的實證依據。

2) 城市分級體系

語言的演變向來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文化水準、地理環境、社會發展等多種因素深度綁定。文化水準不僅體現為地區民眾的文化程度，更與地區的文化輻射力、語言規範傳播力度密切相關。郭必之（2016）指出，在同一語言區域內，核心區域的語言形式往往更易於吸收新元素、發生創新演變，而邊緣地區的語言形式則相對保守，更易保留古老的語音、詞匯特徵。

為更好界定四座城市的發展層級，筆者參考了《中國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及《2021年中國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兩份權威報告。其中，前者由第一財經旗下新一線城市研究所發布，該所長期研究城市經濟，自2013年起年度發佈排行榜，評價體系成熟、資料多元，排名被廣泛引用，認可度高；後者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發布，作為國內頂級人文社科研究機構，其報告數據權威、分析透徹，是衡量城市經濟實力的重要學術參考。兩份報告構建了完整的城市分級體系，可客觀反映四座城市的社會經濟差異。值得注意的是，2016-2022年廣東省內城市排名均有上升，這與大灣區發展推進、區域經濟崛起密切相關，也為語言演變研究提供了時代背景。

圖1：《中國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及《2021年中國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的廣州、香港、澳門、佛山排名（2016-2022）



注釋：1為一線城市、1.5為新一線城市、2為二線城市

從上述排名數據可清晰看出，香港與廣州始終穩居一線城市行列，是大灣區內經濟實力最強、輻射範圍最廣、人口流動最為頻繁的核心城市。澳門自2017年起晉升為新一線城市，這與其博彩旅遊業的規範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升級及與內地的深度合作密不可分。佛山則在2021年實現從二線城市向新一線城市的跨越，這背後是其製造業的強勢崛起、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以及與廣州“同城化”發展戰略的持續推進。

城市分級的差異直接映射在語言演變的軌跡中。作為一線城市的香港與廣州，憑藉其強大的經濟輻射力、密集的人口流動和廣泛的文化傳播，其語音、詞匯系統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在三字格變調方面，兩地的自然變調規律相近，例如在日常交際中，形容事物性狀的三字格詞組，其變調方向、調值變化均保持較高的同步性，這得益於兩地頻繁的經貿往來、人員互動以及媒體傳播的強化作用。廣州作為廣東省的行政中心，外來人口眾多，語言上雖受普通話一定影響，但作為粵語核心區，其語音規範性仍被廣泛認可。香港則憑藉粵語媒體的強大傳播力，其語音特徵對整個廣府片粵語形成了重要影響，兩者相互

作用，共同塑造了一線城市粵語的核心面貌。

再看新一線城市佛山，其內部語音變調呈現出“核心趨同、邊緣保留”的特徵。佛山與廣州、香港的經濟聯繫最為緊密，人員往來最為頻繁，其語音特點呈現出強烈的一致性，僅保留陽平42這一獨特調值，其餘三字格變調方向及常用詞匯與廣州、香港高度一致。這一現象充分說明，佛山地區近年來的經濟崛起和產業擴張，直接推動了其語言系統向核心城市靠攏，語音流變的速度與經濟發展速度呈現出明顯的正相關性。

同為新一線城市的澳門，其粵語語音流變的軌跡同樣印證了經濟發展與人員流動的核心作用。羅言發（2022）的研究指出，早在1941年澳門粵語就已與廣州話高度相似，而與中山、珠海所屬的香山片粵語逐漸疏遠。這一變化的背後，是澳門在二十世紀初就呈現出的人員流動性大的特徵，大量廣州及周邊地區的人口遷入澳門，帶來了核心區域的粵語語音模式。與此同時，澳門在過去五十年間經濟發生了巨大轉變，從傳統的轉口貿易城市逐漸發展為以博彩旅遊業為核心、現代服務業為支撐的發達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進一步加強了其與廣州、香港的聯繫，促使其粵語徹底擺脫香山片的影響，全面貼近粵海片，三字格變調情況也與廣州、香港保持高度一致。

可見，粵語三字格變調的共時演變與城市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繫。人員流動性的強弱決定了語言互動的頻率和深度，交通設施的不斷完善為語言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產業發展模式的轉型升級則推動了不同區域人群的深度融合，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判斷地區語音流變速度的核心指標。

5、廣州話三字格變調的原因

既然變調是不可改變的事實，為什麼是高變而不是低變？過去的語言學研究多聚焦於高平、高升兩類核心變調類型，發現絕大多數變調字的本調為陽平21調，且變調現象多與語義表達相關聯。其核心價值不僅在於豐富了粵語的語

音層次，更在於通過語音的調整，讓口語交流更具表現力、辨識度與流暢度。

粵語的本調系統相對平穩，聲調起伏較為緩和，這使得單純依靠本調進行口語交流時，容易出現語義模糊或表達平淡的問題。而變調的發生，會通過調整聲調的高低、升降與長短，為詞語注入韻律感，形成抑揚頓挫的表達效果，讓口語交流更琅琅上口，便於傳遞情感與強調重點。值得注意的是，高升變調具有鮮明的使用場景限制，僅出現在日常口語交談中，在書面語對應的讀書音裡並無此現象，且多應用於名詞性詞語，這一特徵也成為區分粵語口語與書面語語音差異的重要標誌（黃錫凌 1941）。

1) 區分語義

在廣州話三字格變調的諸多原因中，區分語義最為關鍵。本文所稱“區分語義是變調原因”，並非混淆因果與功能。區分語義既是變調的核心功能，更是其產生的根本誘因。變調的出現，本質是為滿足區分語義的需求，而後固化為語音規律，以此解決三字格使用中可能出現的語義混淆，這便是其作為核心原因的邏輯（本文第二章提及）。

張洪年（2000）認為變調與社會因素相關，其特指功能是語言適應社會交流“精準定位”、避免語義混淆的結果。這種需求令語音調整，變調便是具體體現，可見區分語義的需求是驅動變調產生的重要動因。

姚玉敏（2010）指出，詞義延伸變化常伴隨變調，粵語三字格多有“本調—變調”對應，本調用於正式語境表基本義，變調用於口語表引申義。這進一步佐證，詞義分化導致本調難承載多種語義，變調作為語音調整方式匹配不同語義，其邏輯起點是語義區分需求，而非變調本身，這也體現語言“形式適配功能”的邏輯，是區分語義是變調的核心原因。

2) 浮游聲調

從音系學角度來看，廣州話三字格的高升變調可通過“浮游聲調”理論得到合理闡釋。Yip (1980) 在研究中明確提出，粵語的變調現象與浮游聲調的作用密切相關。所謂浮游聲調，是指不依附于具體音段（聲母、韻母）而獨立存在的聲調成分，它如同一個“隱形”的語音因數，會在特定的語音環境中對相鄰音段的聲調產生影響，最終引發變調。



在粵語的連讀變調規則中，浮游聲調的作用機制主要通過“刪除---替換”過程實現。以三字格詞語“晒日頭”為例，其變調過程可清晰展現浮游聲調的作用。“頭”字的本調為陽平21調，在三字格連讀語境中，受到詞語中高聲調語素（即 H tone）的影響，浮游聲調開始發揮作用。首先，“頭”字本調中的低調部分（21 調的“2”段）被刪除，隨後被浮游聲調的高調成分替換，最終形成高升35調。整個過程中，浮游聲調作為獨立的聲調單位，不改變詞語的聲母、韻母結構，僅通過調整調值，完成變調轉換，最終使“晒日頭”的整體聲調呈現為

33-22-35的組合，符合粵語三字格變調“後字變調居多”的規律。

進一步分析可知，高聲調語素在粵語變調中扮演著“常駐影響因數”的角色。它不依賴於外部語音環境的臨時變化，而是作為粵語音系中固有的成分，持續對相鄰音段產生影響。在三字格詞語中，語素之間存在不同程度的緊密聯繫，而高升35調作為粵語中典型的黏著語素，往往傾向於黏附在詞語的最後一個音節上。這種黏附特性使得詞語最後一個音節受到高聲調語素影響的概率顯著增加，這也是廣州話三字格變調多發生在後字的核心原因之一。

6、總結

本文圍繞廣州話三字格詞語的變調特點及其趨勢展開系統研究，廣州話三字格變調以高平55和高升35為主，且多集中於後字，具體可分為連讀變調和語義變調兩類：連讀變調屬於語音層面，受音系規則主導；語義變調則用於區分詞義或情感，涵蓋名詞、親屬詞、小稱、形容詞四類，需遵循二字格變調規則，入聲字的“變入”現象也進一步豐富了聲調系統，其中語義變調中也有出現變入35的情況。

從社會語言學角度來看，廣州話三字格變調與年齡差異、城市分級體系密切相關。年輕群體因口語化傾向更頻繁使用變調，而年長者則保留較多原調。一線城市（如廣州、香港）的變調趨勢趨於一致，新一線（如佛山、澳門）的變調模式則向廣州靠攏，經濟發展與變調速度相互影響，人員流動等也成為變調演變的核心因素。變調成因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區分語義，通過語音差異精準傳遞資訊；二是音系學層面“浮游聲調”的作用，高聲調語素通過“刪除---替換”機制引發後字變調，提升口語表達的流暢度，說明廣州話變調以後字為主。本文填補了粵語三字格變調的研究空白，揭示了其與社會經濟之間存在的密切動態關聯。

參考文獻

書籍：

- Chalmers, J. (1859). *An English and Cantonese Pocket Dictionary*. Hong Kong.
- Chen, M. Y. (2000). *Tone Sandhi: pattern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tthews, S., & Yip, V. (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 Yip, M. (1980). *The Tonal Phonology of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MIT.
- Yue, O. K. (1972). *Phonology of Yue Dialects 1: Phonology of Canto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白宛如 1998《廣州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 羅言發 2022《澳門粵語音系的歷史變遷及其成因》，清華大學出版社。
- 黃錫凌 1941《粵音韻彙》，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趙元任 1947《粵語入門》，哈佛大學出版社。
- 詹伯慧 2002《廣東粵方言概要》，暨南大學出版社。
- 詹伯慧、張日昇 1988《珠江三角洲方言詞滙對照》，新世紀出版社。

期刊：

- 甘於恩 2002《廣東四邑方言形容詞重疊式的綜合研究》，《首屆國際漢語方言語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8期。
- 郭必之 2016《粵語方言小稱變音的類型及其歷史來源》，《漢學研究》，第2期。
- 黃海維 2004《廣州話中的狀態詞及“咗、畀、嘅”》，《第二屆國際漢語方言語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37-155頁。
- 李小凡 2004《漢語方言連讀變調的層級和類型》，《方言》，第1期。
- 姚玉敏 2010《也談早期粵語中的變調現象》，《方言》，第1期。
- 張洪年 2000《早期粵語中的變調現象》，《方言》，第4期。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one Changes in Three-Character Phrases in Cantones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Hong Kong, Macao, and Foshan

Lee Chi San · Lo In Fat

This paper examines tone changes in trisyllabic words in Cantonese, focusing primarily on the high-level 55 and high-rising 35 tones, with occasional occurrences of the abrupt 35 tone. These tone changes are further categorized into linked reading tone changes and semantic tone changes. The autho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of the Guangfu dialect across three regions—Hong Kong, Macao, and Foshan—analyzing both diachronic (age-related trends) and synchronic (urban hierarchical system) perspective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pa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relates with the rate of tone change. Drawing on insights from lexicology and phonology,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second and third characters in trisyllabic tone-changing words in Cantonese exhibit an agglutin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one changes occurring primarily in the third character. Consequently,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causes of tone change in Cantonese serve to distinguish semantics and floating tones: the former corresponds to semantic tone change, while the latter pertains to linked reading tone change. While most existing literature on Cantonese tone change focuses on monosyllabic and disyllabic words,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gap by investigating tone changes in trisyllabic words.

Keywords: Trisyllabic words, Tone changes in Cantonese, Abrupt 35 tone, Age-related Trends, Urban Hierarchical System

투 고 일: 2026. 1. 10. / 심 사 일: 2026. 1. 15.~ 2026. 2. 15. / 게재확정일: 2026. 2. 20.